

第一章

罂粟种植与鸦片生产

鸦片是由罂粟果桃中的白色乳汁凝结而成。罂粟亦称罌子粟，二年生草本植物，秋种春收或春种秋收。花瓣四片，红、紫或白色。鸦片具有强烈的毒性，吸食后易成瘾，并且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极大影响，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更是巨大，因此，种植罂粟理应受到严厉禁止。然而，中国在近代长达 100 多年的时间里，种植罂粟曾经达到严重泛滥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但是罂粟并非中国古有，它的传入，是中外经济交流的结果，而近代滥种罂粟则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第一节

罂粟种植的历史变迁

早在唐代，阿拉伯商人便将罂粟引入中国西南，此后罂粟在我国即有零星栽种。云南得地理之便，从印度引入罂粟自种，并传入川西、川北，进而由川北传入陕甘。1638 年，地理学家徐霞客在贵州贵定县白云山看到罂粟花，曾大为欣赏。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说：“莺粟花（即罂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牡丹）药（芍药）也”。明朝时，已有人服用鸦片，但主要是用于医学目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鸦片的药用性

能也有记载。不过当时鸦片需要量极少，人们栽种罂粟，仍然局限于家庭院落的小范围之内，用途主要在于供人们观赏或药用。

罂粟的使用发生质的变化，始于鸦片的大量生产，即 19 世纪 30 年代。当时，外国鸦片大量涌入，白银外流严重。清廷内部的“弛禁派”一度占了上风，主张自种罂粟，以土抵洋，挽回利权。道光六年（1836）太常寺卿许乃济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即提出了听任国内种植，以抵制外来鸦片的主张。^①但慑于鸦片的危害，在 1839—1857 年间，清廷依然采取严禁鸦片政策，种罂粟者处斩。故虽有若干地区违法种植，但种植区域很有限，直到 1858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在英国的胁迫下，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种植鸦片的禁令废弛之后，罂粟种植才迅速扩大。1875 年云南全省 1/3 的耕地被用来种植罂粟，鸦片成了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②同时罂粟种植技术也进一步传到陕西、山西。陕西种植罂粟大都集中在南部，道光年间，“秦川八百里，种烟者多。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③山西几乎每县都种，尤以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归化等处种植最多。到光绪末年，上述六州县种植面积达 25404 亩。

晋陕广种罂粟后，周围省份也受到影 响。罂粟种植向东传入河南，向西传入甘肃、青海和新疆，向北由内蒙传入东北。据资料记载，光绪年间，河南种植罂粟，大都集中在豫西，种烟地区吸烟风盛，十人中就有四五人吸食。甘肃引种罂粟始于道光末年，当时有人“购种于陕，要试种之，居然成熟。凉州之武威、古浪所属大靖，产烟最多，其味亦浓。”因此到咸丰时，“各县皆种

^① 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一）第 44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

赖纳德·P·亚当斯《亚洲的祸患与中国毒品的历史回顾》，见《海洛因内幕》第 250 页，警官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第 463 页。

矣”。^①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对这种情形大为惊诧，说：“劫后（回民起义）庶民，元气未复，加以伐，其何以堪。若不严行禁绝，三十年之后，汉人种族其将弱乎！”到了清季，甘肃产烟最多的地区为皋兰、永登、古浪、武威、张掖、武山、甘谷、靖远等县。其中以皋兰五泉山所产者最负盛名，武威所产烟土名“水浆”，当时亦很有名。新疆种植罂粟始于咸丰、同治年间，据资料记载，当时有大批陕甘烟农涌入新疆的奇台、塔城一带种植罂粟，人数每年在万人以上。起初，在塔城中俄边境地区种植，以后逐渐在迪化所属各县选地偷种。这些烟农大都春来秋去，每年如此。东三省罂粟种植情形和新疆差不多，也是由西北种烟区烟农前来开荒种植。到光绪年间“东三省之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②。

鸦片种植除由西南陆上传播外，还由东南海上传入我国。两广和闽浙所种罂粟即来自东南亚。贵州省种植罂粟虽受云南带动，但受两广的影响更大。道光、咸丰年间，两广商人来贵州贸易，除带本地土特产外，还带来走私洋烟来黔推销。烟土价昂利丰，引起贵州绅商的兴趣，因此便有人从广东引入罂粟试种。贵州土质、气候适宜，所产烟土质量甚佳，与洋货不相上下，于是栽种区域日渐推广到黔东各县。咸丰、同治年间，由于农民战争影响，来自两广的烟土断绝，贵州的罂粟种植便进一步扩大到全省。到光绪初年，贵州所产烟土已反过来运销两广。川东试种罂粟也是从广东传入。据《涪陵县续修涪州志》记载，约在道光中叶，“客粤者购罂粟籽种，归如其法试之”。^③道光以后，以涪陵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种烟日渐普及。同治八年（1869）的《涪州志》记载：“远近有种罂粟，牟利倍蓰。”到光绪年间，川东各地已是“罂粟花二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四第 13 页。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第 464 页。

《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七，风土志。

月遍地有之”的景象。1883年冬“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路过涪陵，对这种景象“不胜骇然”。他在日记《南旋记》中写道：“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罌粟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外，皆罌粟油也。”1891年英国人霍伯森在《重庆海关1891年调查报告》中写道：“万县以上种植规模始大，并且在万县与重庆之间正有四川的若干出产最丰的县分。其中有江南岸的涪州和由中部延及北部的忠州、丰都、梁山、垫江、邻水、大竹、新宁、绥定、东乡等县。川东产烟，通过长江，将种植区域扩大到两湖、安徽等省。”山西所种罌粟根据光绪实录是由云南等地传入，但19世纪30年代印度鸦片大量进口时，即有山西商人到广东及南方各省从事鸦片贸易，也从广东引入罌粟种植。并在全省迅速扩大，到70年代末，罌粟种植面积达60万亩，占当时山西总耕地面积530万亩的11.32%^②。

直隶、山东和苏皖北部，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势力北移，罌粟种植也逐渐兴起，不过，由于直隶是政治中心地区，种植较少，所需烟土多由他省输入。山东种植罌粟以充、沂、曹、济四府为最，其余如济南、东昌、泰安、临清、青州、莱州、胶州，种者亦居十之四五。江苏种植罌粟以苏北徐州府属八州县最多。安徽种植罌粟则分布于凤阳、颍州两府各县。据测算当时苏皖浙烟田面积在230万亩左右。^③

通过西南和东南陆海两路的传播，1840年后，罌粟种植已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泛滥。罌粟种植面积超百万亩的省份有五个，即四川、云南、陕西、贵州、甘肃，其种烟面积占全国罌粟种植总面积的76.6%以上。1906年清政府厉行烟禁，罌粟种植大幅度下

《清宣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第23页，道光十一年2月。

王金香《近代山西烟祸》，《山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第461页。

降。据可靠资料记载,1909年,山东、山西、陕西、福建和浙江五省,婴粟栽种面积共计约为92万亩,已较1906年的374万余亩,减少了许多,江苏、直隶、江西甚至基本消灭了婴粟种植。据一些民国老人的回忆,即使是广种鸦片的四川,也只在偏远地区有少量种植。

然而好景不长,辛亥革命后群雄纷起,各边缘省份的军阀为筹措军费,纷纷打出寓禁于征的幌子,鼓励甚至逼迫农民种植婴粟,到1920年前后,大部分省份便已相继恢复婴粟种植,婴粟种植在全国农村迅速蔓延。四川婴粟种植为全国之冠,据1920年调查,东部、北部和西部种植最多,中部较少。1924年地方军阀规定重庆县必须种婴粟10万亩,由84个村子完成。每村必须呈报种烟亩数,如有虚报即行处罚。^①川东涪陵的大柏镇约1148户,户户种烟,附近还有22户租地种烟的农民。而全镇可耕地面积总计11000石,其中鸦片种植面积即达8000石,占总面积的73%^②,30年代四川年产鸦片绝大多数年份在30万担左右,若按亩产50两计算,则婴粟种植面积当在600万亩左右。贵州自1919年以后全省几乎全部种烟,1930年全省烟田面积高达250万亩,云南烟田也有100万亩,陕西约在175万亩左右^③。甘肃除少数贫瘠地区外,各县都种婴粟,烟田占全省农田的3/4,鸦片产额占农作物的90%。辽宁省56个县,种烟面积达200万亩。东北四省直到1936年仍有烟田600万亩。河南全省108个县,种烟县即达80余县。其中豫西、豫东各县种烟最多,约占农田面积的40—50%。禁烟成绩较好的江苏,1927年后种烟又在江北迅速增多,仅泗阳一县

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177—178页,(文海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李珩行《涪陵大柏镇的鸦片经营》,《东方杂志》二十二卷14号。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51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第49页。

即达 4000 余顷，合 6 万亩。^①当时曾有人对全国 13 个主要产烟地区 20 年间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比做了调查：1914—1919 年为 3%；1924—1929 年上升为 11%；1929—1933 年剧增为 20%。^②尽管是部分地区的材料，但足以说明这个时期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的总体趋势。

南京政府建立后着手禁烟，重点是抓禁种，1932 年规定除西南、西北为分期禁种地区外，其他地区一律为绝对禁种省份。由此全国的种烟面积逐年减少。据统计，从 1935—1937 年四川种烟面积由 24820 公顷减为 16277 公顷，云南由 45025 公顷减为 5690 公顷，贵州由 24969 公顷减为 2311 公顷，陕西由 24043 公顷减为 1525 公顷，甘肃由 1935 年的 24070 公顷减少到 1936 年的 20036 公顷，绥远和宁夏分别由同期的 9180 公顷和 11900 公顷分别减为 6928 公顷和 5934 公顷。禁种的成效是明显的，但事实上并未像 1939 年国民党政府所宣布的那样：全国鸦片“均已一律禁绝”，许多地方仍继续栽种罂粟，如川西北的梓潼地区 1936 年后乃广种罂粟，1940 年时达到高峰，该区内重华镇出产的烟土“堰泥”是川土中的上品。据不完全统计，到 1945 年该区种烟土地达 12000 亩。川西南的金阳地区 1940—1950 年的 10 年内也是罂粟种植的极盛时期。种植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40% 左右。川西的马尔康 1943 年后大规模种植罂粟，而属四川第 16 专区的松潘、茂县、理番、汶川、懋功、靖化等 6 县，当地农民原来并不会种烟，1938 年以后，四川内地各县的哥老会分子及投机冒险之徒，蜂拥而来，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第 48—49 页。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271 页，转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359 页，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禁烟统计（廿八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十二（2）334。

《梓潼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 47 页。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第 174 页。

从事罂粟种植第 16 专区始以盛产鸦片闻名全川。后方的其他各省也照样大种罂粟，如甘肃的陇南、甘南藏区一带，农民种植罂粟一直持续到 1949 年。云南澜沧江的卡瓦山、陇川的王子树以及哀牢山等地，1939 年后也依然种烟如故。而景东、镇沅两县的绅团，胁迫农民选取土质好的地方种烟，其他如蒙化、迤西、龙武、镇雄等地也都暗中种烟。事实上，鸦片种植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彻底禁绝。整个近代中国的罂粟种植，绵延了 100 多年。

第二节

鸦片产量的增长与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鸦片进口合法化，本国鸦片的禁令也随之废除。国内鸦片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产量急剧增加。这种不断增长的趋势虽因 1906 年后的禁烟运动而一度受到遏制。但进入民国后的一二十年代，鸦片产量的增长却达到惊人的程度。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鸦片王国”，罂粟花遍地开放，以致于某些洋人将罂粟花称为中国的“国花”^①。西南、西北是鸦片的主要产区，1906 年的产量分别为 364000 担和 114000 担，各占全国总产量的 1/2 和 1/5，其次是华北三省和华东三省，分别约占全国产量的 7%^②。这种情况一直到 30 年代中期南京政府六年禁政开始时才有所改变。据国联禁烟机构的估计，1930 年中国鸦片产量 24 万

《鸦片之今昔》第 66 页。上海图书馆藏。

参见《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Vo I. II. P57, 1909, 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第 457 页。

担，是全世界产量的 7 倍^①。实际上，这一估计是很保守的。根据曾参与四川省禁烟工作的谢藻生回忆，四川在 1917—1934 年的防区制时代，鸦片年产量都在 100 万担以上^②。若加上其他省，产量将更庞大。另据许涤新的调查，1935 年全国种烟面积在 800 万亩左右^③，若按正常年景亩产量 60 两的 2/3 计算，则 1935 年全国鸦片产量为 32 万担，远远高出有关统计数字的 11.97 万担。鸦片实际产量比国民政府禁政机关的官方统计高得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南京政府自 30 年代开始禁烟后，虽然规定了各缓禁省份每年生产鸦片的县数及限种烟土产量。但实际上各省并未切实执行，特别是西南这种半独立省区，地方军阀为自身利益，仍像以前一样，私下鼓励甚至逼迫农民广种鸦片，中央政府的禁令在这些地区几乎是一纸空文。每年上报的数据都是根据中央禁政机关下发的限种计划精心调整过的。一来保护自身利益，二来邀功。而国民党中央禁政机关一方面无实力也不可能下省实地调查，只凭各省自报的数据为准，另一方面为在国际禁烟会议上博得列强赞誉，也不愿真正下去核实。因此这种统计远远不能反映鸦片产量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为了对全国鸦片生产的情况进行比较客观的把握，有必要对各鸦片产区的产量变化作一具体的考察。

(1) 西南产区

云南省在全国最早进行罂粟种植，19 世纪 30 年代就有数千担的产量，60 年代初鸦片产量自给有余，还输出到华南的广州和华东的镇江。回族人民起义时，鸦片生产曾一度中断。战乱后很快又告恢复，罂粟种植遍布全境。1879 年鸦片产量已有 35000 担^④。

① 1934 年国联第 18 届禁烟委员会会议，《禁烟纪念特刊》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禁烟委员会 1975 年 6 月编印。

② 谢藻生《昔忆四川烟祸》，《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③ 许涤新《捐税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中国农村问题》第 60 页，1935 年版。

④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第 392 页，1980 年 7 月版。

1906年已达78000担，占全国总产量的5.3%，鸦片出口收入由1875年的120万英镑增加到1903年的170万英镑^①。鸦片成了云南省经济的主要支柱。20世纪初的禁烟一度遏制了云南鸦片产量的迅速增长，但全省生产的鸦片仍能“足够满足中国吸毒者的需求。”^②1920年云南省地方政府宣布罂粟种植解禁后，鸦片产量很快由该年的21600担增加到1924年的42000担^③。1927年年底仅一次运往安南的鸦片即达16000余担。进入30年代初产量进一步上升，仅麻栗坡一县即年产鸦片50000担^④。实施禁政后的1936年仍有产量7665担。

四川省自19世纪30年代即有鸦片生产，但由于政府的严禁，直至1867年鸦片产区仍只局限在川东的山区及若干田边隙地。1867年采取严禁政策的总督去世后，四川的罂粟种植才开始兴盛。由于四川多雾，冬季干冷，土壤肥沃，极利罂粟生长，因而到1869年罂粟种植已遍布全省，鸦片产量也随之大增，1869年虽然只有7500担，但十年后竟猛增至177000担，增长了近23倍。不仅较同年云南所产的35000担为多，高居全国产量之冠，且为该年外国进口量83000担的两倍以上。而1879年又是外国鸦片进口最多的年份之一，根据1887年海关特别报告估计，四川鸦片产量约有15万担，同样为该年进口鸦片74000担的两倍以上。到1906年四川鸦片产量已高达238000担，占全国鸦片总产量的40.7%，又较该年外国鸦片进口量多4倍强^⑤。这种急速增长的势

赖纳德·P. 亚当斯《亚洲的祸患与中国毒品的历史回顾》，载《海洛因内幕》警官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根据李子辉《云南禁烟概况》数据估算，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96—97页。

俞宁颇《中国鸦片流祸的概观》，《时事月报》第五卷第四期，1931年10月。

⑤ 许达生《苛捐杂税问题》，《中国经济》第一卷第五期，1933年8月。

⑥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第396页，1980年7月版。

头在本世纪初的禁烟时曾一度减缓，但从 1917 年的军阀割据开始，增长的趋势又重新抬头，并进入了极盛时期。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记载：“四川全省，在防区制时期（1917—1934 年）每年烟的产量是 120 万担到 140 万担。”^① 1935 年起，由于国民政府六年禁政的实施，四川的鸦片产量大大减少，但仍在数十万担以上。1935 年上报只有 10 县产鸦片，报表数字为产烟 38 万担；1936 年 8 县产鸦片，产烟 31 万担；1937 年 6 县产鸦片，产烟 26 万担；1938 年，禁烟最后一年，4 县种鸦片，产烟 22 万担，其中涪陵一县就有 7 万担。到 1939 年，规定全省不准种罂粟，自然无上报产烟数字。但种者照种，鸦片产量仍然可观。1940—1945 年川西北的梓潼山区年产量均在 200 担以上^②，川康边区的马尔康在 100 担以上，而雷马屏峨边区垦区则在 5000 担以上。

贵州省种植罂粟开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其间鸦片大多自产自吸，直到 1863 年才有余输往广州和四川。1879 年产鸦片 1—1.5 万担，1887 年则有所下降为 0.9 万担^③。但到 1906 年却猛增至 4.8 万担。民国初期的 1925 年产量虽有所减少，但仍有 2.1 万担^④，进入 30 年代中期则高达 12.5 万担^⑤。

综计西南产区的鸦片产量，1879 年为 22.7 万担，为同年进口鸦片 8.3 万担的 2.7 倍。1883 年增至 26.5 万担，为同年进口鸦片

^① 谢藻生《昔忆四川烟祸》，《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杨开达《解放前梓潼的种烟贩烟吸烟和禁烟》，《梓潼文史资料》第六辑。

路梓常《我所知道的马尔康烟毒情况》，《阿坝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② 叶星《雷马屏边区垦社种烟与九十八师铲烟纪实》，《乐山文史选辑》第四辑。

^③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第 393 页，1980 年 7 月出版。

^④ 中华民国拒毒会编《中国烟祸年鉴》（民国 14 年秋至 15 年秋），第 57 页。

^⑤ 根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 年第 49 页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6.7 万担的 3.96 倍^①。1887 年有所下降，为 18.6 万担，1906 年又增至 36.4 万担，占全国总产量的 62.2%，为同年外国进口鸦片进口量 5.4 万担的 6.7 倍^②。若按全国人均鸦片占有量来说，1906 年西南三省都超过全国平均数 1.5 两，云南为 10.8 两，贵州为 5.5 两，四川为 5.4 两^③。

(2) 西北产区

甘肃省在西北地区最早种植罂粟，19 世纪 30 年代末正是鸦片严禁时期，而甘肃恰在此时开始产烟，原因乃在甘肃地处边陲，清廷鞭长莫及。1872 年德国 Richtigofen 伯爵曾到甘肃说甘肃有鸦片出口到该省以东、以西各省，而未有从其他地方进口鸦片，该地有回民 800 万，鸦片产量约为 5000 担^④。回民起义期间，甘肃的鸦片种植与陕甘一样都曾遭到破坏，约于 1877—1885 年间恢复。根据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援引西人瓦格勒所著《中国农书》所载，清末鸦片弛禁之后，甘肃与四川、陕西、山西并列为全国四大鸦片产区，1906 年的产量达到 3.4 万担。辛亥革命后，甘肃各县很快便相继恢复种植，到 20 年代初，鸦片产量逐渐接近清末水平。据《甘肃民政一年》记载：1925 年全省鸦片种植达 50 万亩左右，按平均亩产烟土 60 两计算，总产达 3 万担，若按最低亩产 30 两计算，总产也达 1.5 万担^⑤。20 年代末生产进入高潮，鸦片产值占全省农业生产总值的 90%^⑥。即使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第 458 页。

台湾“中央研究院”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第 393 页，1980 年 7 月出版。

张寿彭《近代甘肃的烟祸》，载《中国经济史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Morse, TACE. op. cit, P. 348.

⑤⑦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第 464 页。

⑧张宗贤、谢翔云《永昌禁烟记述》，《金昌文史》第二辑。

到了 30 年代的严禁时期，鸦片产量也仍在 1 万担左右^①。

陕西省产鸦片也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但直到 70 年代才成为全国重要鸦片产地之一。陕西的鸦片产量在 1906 即达到 5 万担^②。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迫种，规定每县必须种植 800—2000 亩不等，因此鸦片生产进一步增长。据中华国民拒毒会调查，1925 年度仅陕西关中道和榆林道 8 县就产烟土 1650 担^③。若按全省 40 余县计算，产量当更多。进入 30 年代，鸦片产量一度增长很快，1933 年为 1.6 万担，1934 年为 1.7 万担^④。之后有所下降，1936 年为 8620 担，1937 年为 6708 担^⑤。

山西省在 19 世纪 70 年代才成为全国重要的鸦片产地。1879 年产量为 4000 担，1906 年为 3 万担。与别的省不同的是，清末禁烟运动居然在这里取得了成功。这是绝无仅有的。

绥远与宁夏两省都是进入民国后从甘肃、山西、内蒙划出设立的。绥远的鸦片产量 1933 年为 4326 担，1934 年为 3762 担，1935 年为 2910 担。宁夏的产量较绥远为多，1934 年 1196 担，1935 年 7140 担，1936 年 5184 担^⑥。

西北作为中国第二大鸦片生产地区，人均占有烟土的比例很高，以 1906 年为例，甘陕晋三省人均占有烟土分别为 7.2 两、6.2 两和 3 两，不仅都超过全国人均占有量 1.5 两，而且在全国 20 多

《民国二十七年禁烟禁毒工作报告》，档号四一（2）7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参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第 457 页。

据中华国民拒毒会《中国烟祸年鉴》（民国十四年秋至十五年秋）第 9 页有关数据估计。

④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禁烟半月刊》第一卷第 3 期，1936 年 7 月。《陕西省 1936 年至 1937 年禁烟禁毒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十二（2）358。

⑥ 《民国二十七年十月禁烟禁毒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四一（2）75。

个产烟省份中分列第 2、第 3 和第 6 位^①。

(3) 华北产区

直隶在 1887 年以前所需鸦片主要仰给于山西，1888 年后虽有鸦片出产，但仍不足自给，直到 1906 年还须从东北、山西输入。山东的鸦片生产，1879 年产量有 500—600 担，1887 年增至 3500—5000 担，1891 年又增至 28400 担，1906 年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 2 万担左右^②。山东鸦片产量在 1887 年以后激增，主要是因为栽种区域的扩大，在此以前鸦片生产仅局限于青州、衮州、济宁三府的少数几个县，以后则拓展到全省。河南在 1863 年有鸦片输往上海，1887 年鸦片产量为 4000—5000 担^③。

(4) 华东产区

江苏的主要鸦片产地在苏北的徐州，1879 年该地已有鸦片生产。1891—1900 年徐州鸦片产量每年平均为 57500 担，1887 年以后江苏的鸦片产地更由徐州府所属各县扩展到淮安府的部分县，产量亦增为 10000—15000 担^④。安徽在 1879 年几乎没有鸦片出产，而 8 年后已不但自给有余，还有少量输出上海。以后产量节节上升，1896 年为 3 万担，1901 年为 4 万担^⑤，1907 年已近 5 万担^⑥。这项资料高于鸦片国际调查会 6000 担的估计。浙江最早生产鸦片的地方是台州府，1830 年前后就开始生产鸦片。附近的宁波府象山、绍兴府余姚县也随之出现鸦片生产。由于台州附近多山，鸦片产地拓展有限，产量少，供不应求，因此罂粟种植很快波及温州。

张寿彭《近代甘肃的鸦片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②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第 394 页，1980 年 7 月。又，因资料缺乏，本地区在民国的产烟情况从略。

④⑤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P423, Report from Nanking 1891—1900 转引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第 395 页。

⑥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第 460 页。

温州临海，土壤含有碱质，利于鸦片生产。1878 年温州所属五县出产鸦片 约值银 10 余万元，台州府属各县产量不下数十万石^①。1891 年温州产鸦片 2800 担，其中永嘉县 1200 担，乐清县 600 担^②。就全省而言 产量不下 1 万担，1906 年已达 1.4 万担^③。

(5) 东北、内蒙、新疆产区

东北的鸦片生产约始于 1863 年，主要分布在北部。1878 年曾一度禁种，只产 1000 担鸦片，次年禁令又弛，鸦片种植扩展到黑龙江两省的众多州县。产量增为 3000 担。1882 年后鸦片种植从北部扩展到南部的盛京，1887 年产量进一步增为 8000 担。除东北本身消费 5000 担外，尚有剩余出口到华北。到本世纪初，东三省的鸦片产量已超过万担。根据 1866 年天津英国领事商务报告，内蒙产烟区集中在与甘肃交界的西南部，所产鸦片且极有名。19 世纪 70 年代末后，东蒙又成为国内重要的鸦片产地。新疆南、北路均出产鸦片，但产量较少，直到 1906 年仅有 500 担^④。

(6) 中南产区

根据西人 H. B. Morse 的调查，湖北在 1887 年以前只有鄂西的宜昌府及鄂西南的施南府生产鸦片，1879 年产量约有 2000—3000 担，1887 年产量约 3000 担。到 1891 年湖北的鸦片产地已由宜昌府、施南府扩展到鄂北的襄阳府、鄂西北的郟阳府和中部的荆门州。每府州之下的各县鸦片产量约在 100—900 担之间，总产量约为 1 万担^⑤。相邻的湖南省由于气候与土壤均不适种鸦片，直

①③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 第 460、457 页。

②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转引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第 395 页。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第 396 页，1980 年 7 月。

⑤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第 457 页。

⑥ 根据鸦片国际调查会的统计，1906 年湖北的鸦片产量是 3000 吨，可能是主观估计偏低，以下的湖南、广西二省的统计数字亦有类似的估计偏低现象。

到 1901 年，境内北部的永定、慈利以及南部的新化才有少量劣质鸦片出产，1902—1911 年间鸦片生产扩展到西部山区。1879 年鸦片产量有 1000 担，到 1906 年，据鸦片国际调查会估计仍为 1000 担。广西在清代的鸦片产量亦少，1879 年为 3000 担，1887 年有 3125 担，而据 1906 年的鸦片国际调查会估计，只有 500 担^①

(7) 华南产区

闽粤赣三省气候均不适宜种植鸦片，故产量较少。闽省产烟是 1850 年左右从东南亚传入而开始的，最初仅局限于泉州同安县及龙岩直隶州。1895 年前后才扩大到福宁、安溪、永春、惠安、长泰、南溪、漳浦等县。鸦片产量 1863 年为 500 担，1887 年为 600 担，1882—1891 年为 400 担^②。另据厦门商政局报告，1903 年福建鸦片总产量为 4771 担，其中同安县 2130 担，安溪 318 担，晋江县 300 担，南溪县 294 担，惠安县 186 担，永春县 462 担，长泰县 780 担，漳浦县 300 担。1904 年增长 1 倍，总产量达 9178 担，同安仍居榜首为 4008 担，其他依次为长泰 1520 担、永春 810 担、漳浦 730 担、晋江 620 担、安溪 540 担、南溪 520 担、惠安 430 担。1906 年有所下降仅为 5000 担^③。广东省虽然早在 1863 年种过鸦片，但产量极少。1887 年潮、惠地区生产鸦片约 100 担，仅供本地消费。直到 1906 年也不过 500 担。江西虽在 1862 年即有 300 担鸦片出产，但以后一直没有增加，1879 年的产量为 200 担，至 1906 年时也只有 300 担。

从以上各区鸦片生产的状况可以看出，除少数不宜种植鸦片的省区如广东、江西、湖南、广西的鸦片产量没有多少增加外，其他各产区的鸦片生产都在增长，特别是西南、西北两产区，其增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第 396、397 页，1980 年 7 月。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第 457 页。

长幅度十分惊人。

第三节

罂粟种植的地理分布

在中国农村长达 100 多年的罂粟种植史中，其产区分布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征：一是内陆性，一是山区化。

在地理概念上，内陆相对沿海而言；在经济理论中，内陆性相对开放性而论。19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结构中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单元：东部地区的近代经济和西南、西北等内陆省区的传统经济。有趣的是，全国最大的两个鸦片产区恰恰在西南和西北，这里无论是罂粟种植面积还是鸦片产量都占全国的 80% 以上，以 1905—1906 年为例 罂粟种植面积名列全国前六名的分别是四川、云南、陕西、贵州、甘肃和山西，其中前五位的种植面积都超过 100 万亩，四川更是高达 760 余万亩，山西也接近 100 万亩，为 96 万亩。六省共计种植面积达 1529.6 万亩，占全国罂粟种植总面积的 81.7%。鸦片产量名列前六位的也是上述六省，分别是：四川 238000 担、云南 78000 担、陕西 50000 担、贵州 48000 担、甘肃 34000 担、山西 30000 担，排列顺序也和前述一样。六省总产量达 478000 担，占全国鸦片总产量 81.7%^①。进入民国后，随着其他省区的鸦片生产在 30 年代中期被禁止，西南、西北成为全国仅存的两个鸦片生产区。根据 1938 年国民政府《禁烟禁毒工作报告书》记载：1935 年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宁夏和绥远七省鸦片总面积为 246 万亩，

^① 根据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第 457 页有关数据算出。

产量为 14.8 万担^①。这个数字只是各省的自报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数字，另据可靠的统计资料，仅贵州一省 30 年代前期产量就有 10 万担^②。

就一省而言，鸦片产区的分布也有内陆性特征，主要分布在远离该省经济中心的边陲，如江苏产烟区集中在苏北的徐州，安徽产烟区分布在皖北，陕西产烟区主要分布在川陕交界的关中，湖北产烟区主要分布在川鄂交界的宜昌地区和湘鄂交界的施南地区。

产地的山区化是又一个明显的特征。除东北吉林产地位于呼兰河床，山东、苏北产地位于黄河故道，浙江温州产地位于海滨盐碱土壤上之外，其他主要鸦片产地几乎全在山区（包括山地、丘陵和崎岖的高原）。

西南地区，四川全境的鸦片产地有多处。川东山区产地分布在川鄂交界的巫山、长江南北两岸的大娄山、大巴山及其他山脉和四川盆地东缘丘陵。主要是长江南岸的涪州，长江北岸的忠州、丰都、梁山、垫江、邻水、大竹、新宁、绥定、东乡等县；川西高原产地，分布在雷马屏边区和松藩、茂县、理番、汶川、懋功、靖化等县；川西北山区产地，分布在以梓潼为中心的重华、万寿、文胜、青龙、黎雅等山区，这些地区山峦起伏，林密多雾，腐土肥沃，是鸦片最适宜的产地；川中山丘陵产地，分布在重庆以西的巴县、永川、荣昌、隆昌、富顺、大足、遂宁、叙州等县。全境中仍以川东山区为最主要的鸦片产区。川东各县在 1882—1891 年间的鸦片产量，以涪州最多，年产约 8000 担（比外国进口鸦片

① 《民国二十七年十月禁烟禁毒工作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四一（2）75。该报告书第 18 页表产量显然低估，现根据平均亩产 60 两计算修正。

② 参见王金香《二、三十年代国内鸦片问题》，《民国档案》1992.2。